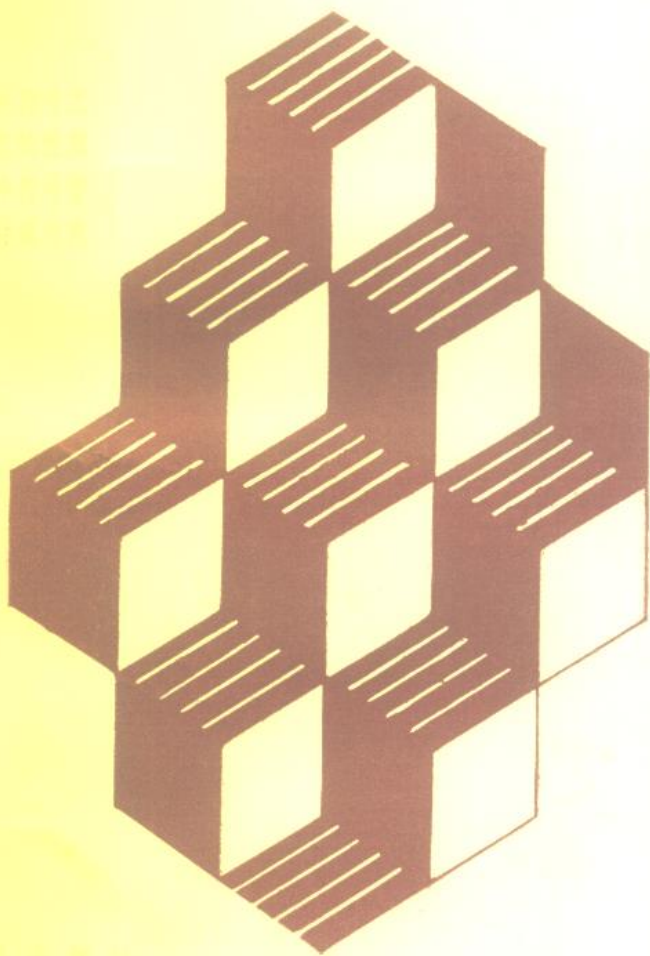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西方 新学科评介

符号学概论

● 著者/[法]皮埃尔·吉罗
译者/怀宇



二十世纪西方新学科评介

符号学概论

都

①【法】皮埃尔·吉罗著 怀宇译①

责任编辑：庞学锋
封面设计：陶雪华
环扉设计：盛寄萍
技术设计：杨 潮

• 二十世纪西方新学科评介 •

符号学概论

●[法]皮埃尔 吉罗 著

●怀 宇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邮电印制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5.25 插页4 字数100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291-2/C·71

印数：1—4000

定价：1.10 元

译 序

符号学，顾名思义，是有关符号的科学；其实，更准确讲，应该是研究符号的意指作用的科学。因为孤立地考察符号，而不把其与指代对象、与其他符号联系起来，是难于有什么结果的。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符号的概念已不再限于人类言语活动的一些标志，它已经扩展到人文科学所有对象的社会-历史实践。神话、宗教、文学，等等，都被视为符号系统。可以说，符号学的发展又为这些人文学科的深入研究开辟了一种新的途径。

今天，符号学已经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有不少人投入对它的新的探索，有不少学科借用它的研究方法，因此，了解其历史沿革和其基本概念以及当前人们的研究方向，对于我们掌握这门知识是很

有益的。



符号（希腊文σημειον一词，创于何时，已无可稽考，但人们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的《解释篇》中已见到对它的使用。他在论述语言时说过：“由嗓子发出的声音是心灵状态的象征，写出的词句，是由嗓子发出的词句的象征。同样，写出的文字，在所有的人那里不会一样，说出的话也不会都一样，尽管心灵状态（对其表达就是直接的符号）在所有的人那里是一样的，以这些心灵状态为其意象的事物也是一样的”（译自法文）。在亚里士多德的术语中，象征与符号是同义词。这里，他已经谈到了声音、心灵状态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对于符号本身提出问题，应首推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约公元前300年前后）。他们认为，符号有其发音的部分，有其被揭示的事物（它取决于人的思维），有其被指示的外部对象。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它们当中，声音和对象是有形的，而事物是无形的。这与我们现在对于能指、所指和指代对象三个概念的理解已极为接近。斯多葛派哲学家是为了建立严密的三段论逻辑而使用

符号的，他们认为，符号系列是按着严格的规则与词一起进行演绎的系统。按照他们的说法，词是真的，因为它们是符号，这就是说，词与事物之间的关系，是符号通过类似言语活动的过程（即莱克图，lekton）来说明的，这样，符号间的关系便象是三段论向外部物质的投影，于是，世界成了可以互相解释的一些语言链。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论争，已经涉及到了意指作用问题，但这个时期的符号学观念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神学色彩，并与语法学难以分开。这个时期的著名论断是：“任何东西都是其他象征的象征”，这就是说，符号之间可以互相说明、代用。这期间，人们已经注意到了意指作用的相对性和可变性。

莱布尼茨（1646—1716年）的符号逻辑学，被誉为近代最壮丽的符号学事业。他全面地发展了斯多葛派哲学家关于符号的思想，认为关于符号的科学，应能排列符号，使其表达所思。他建立符号逻辑的目标，就是把人类的理解力加以数学化。他在《组合艺术》和《单子论》两书中就已经提出了人的理解力数学公式化的一般概念，这种公式化是与意义的不同表现（即一些意指系统）直接关联的。由此，他指出，组合与微积分可以成为意指范畴内的逻辑学，而且，由于社会实践的范围很广，符号

即意指单位，在社会实践的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中，只有具备多义性才有存在价值。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每个词，既按其在各个领域的使用习惯中的位置，又按着其在由各个交叉领域形成的网络中的位置，而具有特征意义。此时，莱布尼茨已经模糊地看到了语言本身的系统性问题是他的符号逻辑难以克服的困难。

此后一些时间，符号学的兴趣转向在词语材料中进行组织工作的能指实践方面。一些学者具体地研究言语活动的材料，并试图根据语法来建立有关理解力的理论，洪堡（1767—1835年）和孔迪亚克（1715—1780年）等人就是这样。

由布尔（1815—1864年）等人开创的公理学，似乎确定了后来符号学发展的程式。布尔在其《逻辑的数学分析》中，在把数学方法引入逻辑学的同时，提出不借助哲学和心理学就可以说明能指过程的一些数学程序。正是在这一道路上，夏尔·桑德·皮尔斯（1839—1914年）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科学，这种科学论述意指作用，论述意指作用诸系统间的可调换性以及它们在物质范畴内的关系，这就是符号学，他用semiotique一词来定名这门科学。在他看来，符号学只不过是更广泛意义上的逻辑学的代名词，他说，符号学是“符号的几乎是必须的或形式上的理论”。他对于能指单位即符号下

的定义，显然是对斯多葛派定义的继承和发展，

“一个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对于某个人来说，是以某种关系或某种能力存在的某种事物。它求助于某个人，也就是说，它在这个人的精神之中创造一种等值的符号，有时是创造一种更为发展的符号。它们创造的这个符号，我称之为是第一个符号的解释者。符号在此是为某种东西即它的对象而存在……”。符号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而分为许多类：图像、标志、象征，等。他的《存在的曲线图》一书，使人看出，他曾试图建立一种广泛的符号学，这种符号学包括逻辑学系统，也包括说话主体的地位，而尤其包括说话主体的陈述方式，以及主体与被指代的对象的各种关系。皮尔斯对公理学方法，做了重大的延伸。他的理论在哲学上是建立在对于意义、表达、符号概念的现象学分析基础上的。人们一般认为，皮尔斯是与索绪尔同样重要的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

我们还不要忘记许多逻辑-实证论者们的研究工作，而尤其是维也纳学派和波兰学派的研究成果。卡尔纳普（1891—1970年）区分了句法、语义学和语用学，把它们看成是符号-逻辑陆地的内在区域，他说：“一种语义系统，是一种规则系统，它们陈述一种语言对象的句子的真实条件，并通过这种方式，陈述这些句子的意指作用。”

C. W. 莫里斯 (1901—) 把符号学设想为关于象征性的综合科学，其中包括美学、认知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学科属于符号学的实用部分，符号学为这些学科承担着“组织科学”的角色。

F. 索绪尔 (1857—1913年) 对于符号学的设想，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作为现代符号学奠基者的他与皮尔斯之间，人们参照较多的还是他的理论。他把言语活动看成是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不同于纯粹的逻辑系统。他似乎对言语活动对象使用了完全是现象学的一种方法，来寻找语言体系本身的特定性。他从语言学本身开始，以语言符号为例，明确了符号的一些概念，他说：“语言符号取决于能指与所指的结合”，“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如果语言是词语（即符号）之间的游戏，那么，意指作用，便是语言体系与社会力量在最后时刻认定的专门规则所产生的“价值”。研究符号，要求人们超出形式的系统本身，以接近“社会生活的内部。”因此，符号学，作为符号的科学，将部分地与一般社会科学结合，因而它并不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形式化。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不是旨在建立逻辑-实证主义的公理学，而是建立不排除社会和心灵的意指作用理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写道：“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

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 来自希腊语sémeion “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语言学只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确定符号学的恰当地位,这是心理学家的事,语言学家的任务是要确定究竟是什么使得语言在全部符号事实中成为一个特殊的系统。……语言比任何东西都更适宜于使人了解符号学的性质……语言的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① 这里,索绪尔明确了语言学 and 符号学之间的关系,并预示了语言学研究将会对普通符号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二

我们来介绍一下符号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理论,然后再扼要叙述一下现代符号学的研究状况。

首先,符号学属于传播学。符号为传播一定的信息而用,不用于传播目的的自然标志(动物的踪迹,自然现象,人的某些动作)则算不上符号。乔治·穆南把符号学限定为人类的传播学,以此区别于动物(例如蜜蜂等的一些动作)的传播。因此,

①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7—39页。

语言，语言的各种辅助手段，宗教仪式，礼仪，交通讯号，等等，都是符号，而对于它们的特征、它们的系统、它们的意指作用的研究，则是符号学的主要内容。

既然符号学属于传播学，那么，传播的构成要素自然也适用于符号学。这就要有符号所指示的客体即指代对象，要有符号，要有把符号组织在一起的规则即编码，要有传播手段（电视、书籍，等）显然还要有发送者和接收者。这些要素，依据传播方式，有时是同时出现在传播活动之中（例如讲话者面对听众谈论现场发生的事情），有时则是一部分出现在传播之中（例如书籍，发送者即作者一般是不出现的），而且各种要素的形式也因传播方式不同而有别。

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方面，即能指与所指。按照索绪尔的解释，能指的是“声音形象”，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叶姆斯列（1899—1965年）把这两方面称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这两个平面的结合分为任意的和动机的两种。非象形文字的音意之间就是任意约定的，英文中的Pine和“松树”之意之间的结合显然就是这样，但这样的符号一经约定，就不能随意更改。动机性是指这两个平面的结合中带有人的意愿，这便是图像和艺术作品等的情况。不过，任意约定的符

号可以再赋予动机，这时，动机可以起到解放约定的作用。例如苗圃中的“松树”只是一个事物的名称，但这同一个符号若是进入了把学校比作苗圃的文艺作品中，松树就和苗圃一起被赋予了动机，它便离开了原先的约定，转而指在校成长的学生。任意性约定产生单义符号，动机性可以产生多义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意指作用的学科。从定义上讲，意指作用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既指两者之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可称之为涵义。但是，符号必须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不组成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仅仅是一种结合。在系统中，符号相互依存。实际的情况是，有不少符号的组合使人难以看出系统，因此，在表面上是非系统的符号组合中确定系统的存在，就成了寻求意指作用的重要任务。

系统，是靠编码而成立的。但在现代符号学术语中，它们是近乎同义的。我们说符号组成系统，实际上就是符号借助编码组织起来。因此，意指作用就是建立在编码基础上的。编码，就是规则，就是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不过，有的约定明显（例如电码、旗语）有的约定不明显；有的约定严格，有的约定较宽松——甚至难以使人看出系统的

存在。但是，不管怎样，意指作用或多或少都是靠编码而存在。在约定明显和严格的情况里，意指作用是很容易找出的；而在约定不明显和较宽松的情况里，确定系统的存在就较为困难，符号的价值就可以随使用者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时，意指作用呈现出某种开放性。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中，逻辑编码（包括科学编码）是明显的、严格的；美学编码就是不明显的，较宽松的。

必须明确的是，意指作用与意义不同。意义一般被认为是进行符号学分析之前讯息提供的意向。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1915—1980）举的一个例子大概可以说明两者的区别：他有一次在理发店里看到一期《巴黎竞赛》杂志“封面上是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在行军礼，他双目向上，可能凝视着飘扬的三色旗。这就是画面的全部意义”，但是，他“非常清楚地理解”它对他“指示的东西：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全体国民，不受种族歧视，忠实地在她的旗帜下效力，这个黑人在为他真正的压迫者服务时表现出的热忱，再好不过地回答了那些诋毁所谓殖民主义的人”，这便是这个画面的全部意指作用。

符号的集合或多或少都是系统的。把它们分为系统意指方式和非系统意指方式是不科学的。但是，现代符号学家们却经常使用“有句法系统”和

“无句法系统”来区别排列上有无章法的符号组合。无句法系统指的是符号的简单拼合。有句法系统可以分为时间句法和空间句法。语言符号的链系连接，音乐等，因符号的出现先后有序而具有时间句法；绘画、雕塑等则是在空间安排符号，具有空间句法。当然，也有对这两者兼而有之的混合系统，如舞蹈、电影等。

句法，实际上就是结构，与此直接有关的，就是分节问题。在传播中，一讯息在其可以分成一些能指成分时，它就是分节的。言语活动的分节是最明显的。按照马丁内（1908—）的理论，言语活动属于双层分节，第一次可以切分出词素，第二次可以切分出语音单位，即音位。一般认为，双层分节是语言的独特性质，这一性质可以把语言与其他符号系统区分开来。但是实际上，人们正是根据这种分节性质，研究了技术传播的各种系统。

分节不仅可以用于能指方面，也可以用在所指方面。当所指系统能够分节的时候，这就存在着能指系统的分节与所指系统的分节之间、这一些所指的分节与另一些所指的分节之间有没有对应性，在有对应性的情况里，这就是同系关系。同系关系是一种结构上的类比。类比关系和同系关系，是符号的两种基本关系，但同系并不排除类比。动物与人，具有许多共同

之处，可以是类比的，但从构造上，人和动物都对应地具有嘴、手（爪）、足（趾）、等等，因此，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同系的。理解了这两种意指方式，对我们理解由人类的各种社会实践所建立的符号系统大有帮助。实际上，我们的大部分科学和知识都是建立在能指上相互接合（即确立某些关系）、所指上属于同系结构的一些符号系统上的。在现实中，当确立一门新学科时，人们大多都是从邻近学科里寻找相近的结构，把这种结构当作能指去说明新的学科。我们在古代的文化中，可以找出大量的例证。占卜术、星相术、阴阳说，等等，都是这样。我国古代借阴阳之对立，不仅说明日、月之别，而且说明生、死，说明身体的健康与疾病（例如中医学的阴阳之论）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同系的这种繁衍，就是借用模式，就是借用“格网”。但是，这种借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两个系统在人们的一定的认识阶段上所指具有同系关系；2.被借用的能指在原系统中必须反映真实关系。然而，这种繁衍，这种借用，也会带来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人类关系便几乎要固定化，另一方面，也可能赋予它们完全无关的特征（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内容）。

符号的分类研究，导致了符号学研究的各个分支。语言符号的研究，至今还是最重要的，因为，

它简直就是其他符号研究的基础和模式。但是，本世纪40年代由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和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诗学，都使人们看到，符号学在不少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

三

当代符号学研究的三个趋势：

1. 关于能指系统的类型学

本世纪，符号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地研究社会范围内各个领域的能指系统，即表达系统。到目前为止，这种研究一般都是把语言的能指模式移用到所研究的社会现实方面，当然，这也与所研究的对象都是语言文学产品直接有关。这种研究，发端于20年代俄国的形式主义，后为布拉格语言学派和今天的许多符号学家所继承。罗兰·巴特等一大批本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论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探讨叙事文学本文的陈述结构，写出了不少重要的著作，从此，文艺符号学出现了。

列维-斯特劳斯的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也采用了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他把亲戚关系的结构当作特定社会传播的系统，当作保证社会内聚力的特定形式的一种“言语活动”。除此之外，他还把语言符号系

统的转换概念用在了印地安人神话的分析上，从而使神话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在这些研究中，符号学呈现出方法论的特点。这种方法，帮助我们探讨社会实践的隐蔽的逻辑关系，使我们看到了能指系统的多样化和系统间的可转换性。

2. 语符学

叶姆斯列等哥本哈根派学者，完全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学的理论，使其获得了更为理论化的特征。他们的学说，叫作“语符学”。叶姆斯列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某一时期内一个独立配套的自足体系，而不是语文事实的混合物。他所确立的理论，比索绪尔的理论更抽象、更缺乏语言物质，因此，也就更有利于提出关于意义生成过程的超言位、超语法的一种符号学。言语活动是一种过程，语言符号学应能描述这种过程。

他认为，表达与内容，形式与实体之间具有既相互关联又互为前提的关系。一种意义，可以在每种语言中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形式，并且有时是在不同的符号学系统中获得形式，意义，每一次都是一种新形式的实体。

叶姆斯列的理论对现代符号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所确定的许多概念都已为人们所接受。

3. 语义分析论